

新世纪小说中妓女形象谱系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雷 鸣*

〔摘 要〕 新世纪小说中所塑造的妓女形象,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喻体,一种感知与体验新世纪中国现实的叙事符码,一种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媒介。“逼良为娼型”的妓女形象,以妓女苦难叙事揭示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等,追问现代性的冷酷;“赏心乐事型”以妓女自甘堕落的愉悦叙事,批判消费主义时代的精神病像,“知亡国恨型”延续“妓女救国”的故事母题,表明作家重返传统的取向。这三者均表现出反思、质疑与批判现代性的立场。而“从良幻灭型”则对阻滞现代性的传统道德观念表达出愤怒,彰显的是吁求现代性的急切。同为妓女形象,扭结了对现代性不同的价值立场,亦充分说明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 新世纪小说;妓女形象;现代性

妓女形象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凝眸瞩目的一个特殊群体,不少名家名篇就卓异地塑造、描写了妓女形象。关于妓女题材的文学创作,由于作家所处的历史情境与创作旨归的差异,他们对于妓女形象塑造亦有所不同,但大多数作家一般是通过对妓女形象的塑造与想象来寄寓他们个人的某种幽微情怀,或者表达现代民族国家、社会制度和妇女解放等宏大命题的思考。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每一种社会阶层与社会性别的组合看待娼妓问题都有不同的参照点;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位置,娼妓问题对于不同的阶级和性别组别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①对新世纪以来小说所塑造的那些蔚然大观的妓女形象,亦可作如是考量,作家对这些妓女形象的文学叙述,同样扭结了“有关政治权力和文化转型,国民性和文化归依感等等问题的讨论”之丰富的语义场,是新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性别建构和精神文化等现代性相关的表征符号。考察这些形象类型,有助于反思当下中国现代化境遇的特殊性,并能提供观察新世纪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发展脉络的特殊视域。

一、逼良为娼型:生存苦难与城乡权力结构

在新世纪小说中这一类型的妓女形象,是指乡村女人不堪忍受乡村的苦难与不幸,或遭逢了不公正的境遇,于是进入城市企求新的生活。然而在都市里,她们又不断地遭遇歧视、陷阱和险境,付

* 雷鸣,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071002。

① [美] 贺萧:《危险的愉悦:2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5 页。

出了身体和精神的惨重代价,最后走投无路不得不沦为妓女,依靠出卖身体挣钱。贾平凹《高兴》中的乡下女人孟夷纯之所以当妓女,是为了挣钱破案给亲人报仇;王祥夫《米谷》的主人公米谷,为赎回被黑社会抢去的儿子、治疗被公职人员打伤致残的丈夫,同样选择作妓女挣钱;陈然《报料》中的姐姐为了担起父亲瘫痪在床、母亲精神失常、年幼弟弟们还在读书等家庭负担,决定卖身赚钱;乔叶《我是真的热爱你》中的姐姐冷红原想通过辛勤工作来挣钱,宁可卖血也不卖淫。妹妹冷紫更是拒绝沉沦。但两姊妹都是遭到鸨母方捷的暗算失身后才“破罐子破摔”。方捷本人也是在深圳受骗后才变得邪恶,城市成为这些纯洁女子沦落的推手。还有何顿《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金小平,乔叶《紫蔷薇影楼》中的刘小丫亦莫不如此。其实,这种逼良为娼的“苦难沦落”叙述模式并不鲜见,一直点缀于自五四以来的写实派文学、左翼作家和部分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之中,老舍《月牙儿》中的母女、《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王统照《湖畔儿语》中的母亲、蒋牧良《夜工》中的“她”、马彦祥《母亲的遗像》中的月红、叶紫《湖上》中秀姑的母亲、《日出》的小东西、翠喜等,无一不是这种妓女苦难叙事模式的运用。现代作家们之所以聚焦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妓女身上,呈示她们的苦难与不幸,意在控诉和揭露黑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现实政治。

但在同为“苦难妓女”故事套路之中,新世纪小说中“苦难妓女”形象,又显示出同向的歧异之处。一是妓女的身份无一例外地纯然为“乡村女性”;而现代文学中妓女身份没有框定为乡村女性,其身份呈现多层化,既有都市底层女子,又有破落的贵族。二是处于源自都市压迫力量的环境之中;而现代文学的妓女并不全然是栖息于都市,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妓女形象,则栖身于沅水河畔。三是出卖“身体”,供都市男性消费,是在都市立足的唯一办法。新世纪小说中的这类“妓女”只是都市男人欲望的发泄与消费的对象。现代文学与其不同,如郁达夫小说中的男性多为精神孤独与苦闷者,而从妓女那里寻求慰藉。从“乡村女性”、“都市压迫”、“出卖身体”、“男性消费”这几个构成新世纪“苦难妓女”形象独有的要件中,我们很容易抽离出几组二元并置的范畴:乡村/都市;女性/男性;提供身体/消费身体。不难发现,在这些范畴之中,都市与男性是主动与施与者,而乡村、女性则构成了被动与承受者。乡村只能是女性的,是弱势的,是消费对象;而都市则为男性的,是强势的,是消费主体。王宇指出:“现代文化的演变以二元对立意识的发展为标志,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任何一个要素要想成为主体就必须首先确立一个客体,即造出一个他者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无论是民族国家主体抑或是个人主体都依赖处于低一级的客体性、他者性来确立自身,而在文化象征系统中,女性表象便常常成为表征客体性,他者性的能指。”^①照此文化运作模式,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结构逐渐扩容而成为一种文化隐喻,这种性别关系中的不平等隐喻了城乡关系的不平等,城乡关系与性别关系开始了彼此的交相缠绕。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现代化语境里,城市是现代化发展的中心与主体,现代化的方方面面均辐辏于此,而乡村则被边缘化与他者化,须为现代化付出巨大牺牲。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一直存在于中国现代性方案的设计之中。恰如有论者所言:“纵观城市的历史,乡城关系已经演变为一种雇佣关系,即城镇为了自身的发展而掠夺农村,而城市的先进地位又因工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伴随着工业经济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结合,城市最终征服了农村,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不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以及工业中心的不断扩大,增加农村对城市的依赖性,进而剥削农村地区铺平了道路,但在事实上,这不仅意味着城市对农村的剥削,而且意味着城市特权阶级对农村居民以及城市非特权阶级的剥削。”^②正是因为城市对农村的掠夺与剥削,都市麇集了大量的政治、经济资本,成为权力文

^①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0页。

^②[英]安萨里:《在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第一届全国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词》,江龙译,《民族译丛》1993年第6期。

化集中的场域。而由乡入城的乡村女性没有任何政治、经济资本,在苦难与困厄下,只能以身体作为唯一的资本,去换取生存的经济资本。“‘打工妹’兼具了社会地位弱势和性别弱势的乡村姑娘,在她们与现代都市遭遇时,便已经注定了潜在的躯体丧失的可能,身体作为世间唯一真切地属己之物,作为存在的初始,其被掠夺被扼杀被出卖的境遇深刻证实着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被迫丧失自身的历史命运”^①。从这个意义上观之,乡女进城,被迫无奈,纷纷沦落为妓,其实为潜藏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都市权力结构逻辑所支配。

依此,在新世纪的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综合国力显著提高,新世纪小说这类“逼良为娼”的妓女类型,显然不同于老舍小说以妓女作为黑暗社会的罪证,不同郁达夫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精神相契之寻求,亦不同于沈从文之“构造人性希腊小庙”;而是当下中国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喻象。乡村女性由乡入城,备受苦难,唯有出卖身体的“华山一条路”,暗示着乡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遭受苦难和沉重的代价,当乡村遭遇城市时,乡村面临的似乎是一条万劫不复的道路,承受巨大的牺牲,但又别无选择。所以,新世纪小说运用这种“妓女苦难”表述,是站在乡村立场,对中国在现代性推进过程中缘于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都市权力结构的审思与批判。

二、从良幻灭型:乡土中国与超稳定文化结构

所谓“从良幻灭型”妓女形象,是指乡村女人在进城之后曾有过作妓女的经历,而当她们转身返乡试图告别妓女生涯,回归正常的人生轨辙时,却因妓女的身份烙印,遭到了乡村传统道德伦理的不容、蔑视与绞杀,从良不得而只好无奈地走向悲惨的境地(或自杀、或出走)便成了一种宿命。如果说新世纪小说中“逼良为娼型”的妓女形象,示喻着基于城乡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性冷酷一面的拷问,呈现出反思现代性的精神向度;那么“从良幻灭型”这一类妓女形象,则暗示在现代性进程中乡村传统文化因子的巨大存在与影响,揭露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道德秩序中特有的残酷与冷漠,表达的是对现代性焦虑与启蒙的精神向度。

借这类从良幻灭型的妓女形象来批判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表达对现代性的冲动与启蒙,早在1940年代,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的形象已是这种书写路向的先行者。时至新世纪,从良幻灭型妓女形象依然不断地闪现于作家的文本之中。她们不论何种原因沦为妓女,总是得不到原谅,都想从良开始新的人生,然而妓女的经历却如恒定的魔咒缠绕着她们,成为难以逃避和不可言说的触痛,从良之梦总是不可避免、无一例外地破灭,人生的不幸亦成为一种必然。如刘继明《送你一束红花草》中,乡村女人樱桃曾在城市当妓女赚钱为家里盖房子,为弟弟交学费,可是当她不幸染上性病回家后却被父母骂了出来,父母嫌她丢人,她只好一个人在野外小屋里凄惶度日,忍受疾病的折磨和死亡恐惧的笼罩,加之村人的羞辱谩骂,最终选择跳河结束自己悲惨的生命。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季栋梁《燃烧的红裙子》里,乡村女子红喜因村里干旱没收成,就跟着大伙到城里去打工,她在城里做妓女,卖淫时被警察抓住遣送回农村,红喜回家后得到的是无尽冷眼和羞辱,她没想到回到家,“比公安抓住了还害怕”,于是有一天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跳到自家的水窖里自杀了。何顿《青山绿水》中的杨小玉曾为生活所迫在县城做过妓女,从良后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开美容店,并且有了温暖平静的家庭生活,然而随着妓女经历的曝光,一切都被打碎,夫妻反目离婚,还要不断忍受别人的指指点点。

^①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596页。

新世纪小说与1940年代作品息息相通地“同气呼应”，充分说明这种“妓女不容于世”故事模式书写之可行性的同时，也表明这类妓女形象的诞生背后一定潜藏着绵延不绝的文化箝制因素和牢固的中国经验基础。正如陶慕宁先生所说：“妓女总以为从良是最好的归宿，殊不知社会、家庭、伦理以及男子见异思迁的天性都排斥妓女进入伦理系统。一朝沦落，终身蒙尘，这才是妓女最深刻的不幸。”^①妓女们“最深刻的不幸”也正是因为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顽强地排斥着、鄙视着妓女，正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典贞洁观，无论时光怎样流转，依然阴魂不散。

不可否认，自新世纪以来，现代性经验更深入亦更全面地漫漶于中国，新世纪乡村深受现代性的震荡和介入。乡村的传统文化因子在现代性狂飙突进的裹挟中遭遇萎谢，故此，新世纪以来，有不少作家对乡村传统文化流露出深深的哀挽情调。如贾平凹《秦腔》以细腻实录的笔触，写出了现代性引致农村的传统文化的崩溃；阎连科《受活》则以寓言的形式，通过荒诞的笔法，描写出现代性肆虐地解构了传统的乡土文明的价值观。还有阿来《空山》、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也都是站在现代性反思的立场，叙述现代性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腐蚀。然而，问题不是单向地对现代性予以批判那样简单，由于中国社会语境的复杂性，现代性尚未在中国形成一种彻底的扎根状态，因为“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程度的核心指标，不应当是经济增长等外在的特征，而应当是人的行为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文化机理的现代化程度，即现代性的生成状况”。如果从这样的视角来看现代性在中国的境遇，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一味要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程度，还是如衣俊卿所言：“就中国的状况而言，现代性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它只是以碎片的、枝节性的、萌芽的形态或方式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会理论和精神的流动之中，出现在社会运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侧面，而没有作为社会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结构、图式、活动机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植入、嵌入、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之中。”^②由此不难断言，在中国语境中，现代性只是处于一种悬浮无根的状态，尚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关涉个体生存、公共生活、社会运行的内在的文化机理。

正因此，尽管新世纪乡村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传统文化中内在的深层结构、心理图式、道德秩序等诸多方面，依然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生成之顽强的文化阻滞力。换言之，那种乡村的风俗、伦理、价值观以及具体的生活场景，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即如孟繁华先生所强调过乡村中国的超稳定文化结构：“那种超稳定的乡村生活的表意形式或文化结构，如宗教、仪式、婚娶、娱乐、庆典乃至两性关系等风俗风情，则超越了时代甚至社会制度而延续下，它强大的生命力远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③这种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存在，表明“妓女不容于世”的故事模式有着坚实的现实文化基础，新世纪小说中之所以出现诸多“从良幻灭型”妓女形象，是作家们想借此表达对阻滞现代性的超稳定文化结构的批判，表明着即便是现代性狂飙突进的新世纪，传统伦理还是如此的强大与狰狞，乡村的启蒙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三、赏心乐事型：逍遥肉身与时代精神病像

如上所论，“逼良为娼型”与“从良幻灭型”这两类妓女形象，基本上是以苦难悲情作为共同的底色，她们沦为妓女，多是外部环境挤压逼迫所致，或因为生活的困顿不堪，或由于人生走投无路的绝

^①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②衣俊卿：《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阻滞力》，《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

^③孟繁华：《坚初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望,或缘于他人的陷阱欺骗。总而言之,她们之沦落风尘是悖逆自己意志与愿望的,是无可奈何的被动选择。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对妓女有一种惯有的认识:“‘被迫’进入娼妓业的这种说法成了社会上共享的,经常被重复的真理性认识,千变万化的个人和社会处境都被纳入了那单一的公式。”^①与此不同的是,“赏心乐事型”的妓女形象,是指她们走上做妓女的皮肉生涯,没有苦难悲情的生活重压,没有邪恶他者的挤兑与算计,纯粹是发乎自己内心的愿望,是自身主动选择的结果或曰自甘堕落,她们充分享受着身体置换金钱、放纵欲望的快乐。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人们所说的娼妓莫不因金钱所驱策:“严格意义上‘娼妓’,即以出卖肉体 and 色相为职业,为了金钱向不同的男子提供性服务者。”^②但“赏心乐事”型却附着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她们为金钱卖身,没有丝毫的“生活所迫”,而是彻底的“心甘情愿”。

作家在塑造这类妓女形象时,几乎很少叙述她们是如何沦为妓女,而更多地表现她们以身体换取金钱的初衷以及选择“妓女生活”的主动和自觉:没有被迫,非不得已而为之,亦没有屈辱与痛苦,甚至有些自得其乐。如铁凝《小黄米的故事》中的年轻妓女小黄米就是如此,她每天悠闲地等待客人,客人来了,她爽利地脱衣服,淡定地与客人讨价还价。林白《去往银角》中的“我”是自己希望到银角做小姐,认为这“不是什么堕落,而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不但不是堕落,反倒是壮举”。乔叶《紫薇影楼》中的妓女刘小丫,从事小姐工作不是贫困的逼迫,也不是生理上的欲望所致,她认为当小姐是顺理成章的事,她把自己卖出去,为的是获得今天生活的原始资本积累。王手《乡下姑娘李美凤》中李美凤的理论就是“钱对于乡下人来说是很大的,她不动心是不可能的”,而“乡下人的身体算什么呢?反正迟早要被人睡的,在家里被一个没出息的乡下人睡,还不如用睡来换个靠山”。邵丽《明惠的圣诞》中明惠选择当按摩小姐来实现赚很多钱的计划,目的是“有自己的房子,嫁城里人,当城里孩子的妈,成为城里人”。梁晓声《贵人》中,女大学生素接受了通过身体来换取衣食无忧的日子的哲学,而走上了这条道路。

在这类“赏心乐事型”妓女形象中间,除了为金钱而自甘堕落外,还有一些之所以主动为妓,纯然是为了放纵欲望,愉悦身体,尝试体验别样的生活。如艾伟《小卖店》中的小蓝,不是生活所迫,不是人生受挫,不是上当受骗,而是自甘如此当小姐,她自我感觉非常好,觉得能够与不同的男人周旋,让男人为自己着迷。当她把自己的恩人苏敏娜的丈夫拉下水,摆布在床上时,她心里“有潮水般地快感”。田耳《友情客串》中苏小颖因男友在家公然嫖娼,她怀着失恋的心情到县城找自己中学时代的闺蜜葛双,而此时的葛双已经是一个妓女,葛双皮肉营生时独特的性体验诱惑着情场失意的苏小颖,她不禁客串做起了妓女,失意之后的情欲以变态的方式得到了满足。吴玄《发廊》中方圆妹妹之所以去发廊从事色情服务,并不是因为要承担家庭责任,而是因为她已经在已经做妓女的好友晓秋身上发现了“一种她所向往的生活”。

总之,“赏心乐事型”妓女形象有着共同的特点:她们奔赴卖身现场,没有了水深火热的苦难历程,没有了黯淡无光与痛苦无比;相反地,在金钱和欲望的双重挟持下,她们把做妓女视为“赏心乐事吾家愿”,对皮肉生涯更多的是平静与认命、主动与自觉,满足与自得,并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为人处世的规则和一套独立的道德评价体系,为自己寻求着最佳的心理平衡点。与“逼良为娼型”、“从良幻灭型”两类妓女形象比较,不难发现,在塑造“赏心乐事型”妓女形象时,那种惯常运用的苦难悲情“被迫”模式已被彻底悬置,转而从金钱和欲望的角度来,勘测女子快乐投身色情场所的“心甘情愿”。

这种由“苦难被迫”到“愉悦自愿”的叙事话语转型,是新世纪中国现实另一个侧面的镜像。事实

①[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364页。

②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

上,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步入急剧转型期,市场经济的确立与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中国进入消费主义社会或准消费主义社会,“当代消费文化正在由发达的城市向广大的农村扩散和蔓延,逐步成为一种社会的准意识形态,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表达的主要形式和自我认同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深深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和阶层划分”^①。不言而喻,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消费主义时代已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状况的有效概括,也是摆在我们面前客观存在的文化语境。换言之,消费主义已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深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通常有两点:一是商品化逻辑。在消费主义语境中,商品交换原则笼罩着社会生活的全部,商品不仅是物质实体,而是一种观念意识和社会运行机理。如波德里亚所论:“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及个体的幻像。”^②二是欲望满足的享乐主义逻辑。消费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实际生存的需要,而是不断满足被现代化刺激起来的欲望,欲望成为了消费主义发生的动力源和最终诉求,“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③;又如迈克·费瑟斯通指出:“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④

很显然,“赏心乐事型”妓女,要么以身体置换金钱,或者说是以性资本换取经济资本;要么自甘堕落、放纵欲望,追求快乐,这都契合着消费主义社会的文化逻辑。她们正是消费主义社会无尽欲望的象征,也是追求享乐主义的适切符码。如此,她们进入文学叙事之中,便成为了表征消费主义社会重要而行之有效的叙事代码,“无论妓女卖淫有什么具体的动机,当她们出现在其他人的文字作品中的时候,她们已成为普遍的不满和渴望的强大化身了”^⑤。这样一来,“赏心乐事型”妓女形象便具有了奇妙双重功能,既可以作为镜像呈现消费社会中那些欲望化的场景,亦可以展开对消费主义文化所引致的道德沦丧、价值失范、精神放逐、理想隐退等负面效应展开批判。至此可进一步推论,既然新世纪小说通过“赏心乐事型”妓女形象来展示消费主义的时代精神病像,那么我们完全理由得出结论,其旨归与新世纪以来那些哀挽乡土传统文化萎谢的作品是殊途同归的:同样是恪守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质疑的立场。因为众所周知,消费主义文化事实上是现代性发展的一种晚期状态,其本身是从现代文化发展而来的,而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出现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的。

四、知亡国恨型:商女抗日与缓释文化焦虑

在新世纪小说创作中,不少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妓女抗日”作为写作题材。我们知道,杜牧有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意指青楼女子无兴亡之叹与家国情怀。此类“妓女抗日”题材小说中的妓女形象,却非常“知亡国恨”,她们或于国人同胞危难之际,勇于自我牺牲地挺身而出;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参加抗日救亡,为国奉献尽忠,我们不妨把这类妓女形象称之为“知亡国恨型”。如严歌苓《金陵十三钗》中的13个风尘女子就是以自我牺牲而挽救同胞的血性侠妓形象。同样,石钟山系列小说《一唱三叹》中的一篇《冢》塑造的妓女形象“一品红”也颇具英雄气概。故事

①郑崇选:《镜中之舞——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叙事》,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度博士论文,第16页。

②[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③[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17页。

④[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

⑤[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369页。

讲述的是日本人要求沿河村派花姑娘送到炮楼里,如果没有人去,每天就到村里抓一个男人杀死。族长老泪纵横哀声长叹“谁能救我族人”,此时站出来的却是窑姐儿“一品红”,一品红进了炮楼,沿河村也就平静了。一品红在一天夜里引爆了炸药,把炮楼炸成了一片废墟,与鬼子同归于尽。韦俊海《浮生》中的柳州妓女抗日救国的行为,亦感天动地,“春柳院”的妓女们组成抗日捐款队,到五十公里外的昆仑关战场为国民革命军捐款,因日军飞机狂轰乱炸,所有的姐妹英勇阵亡。

商女也知亡国恨,类似的“抗日妓女”形象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出现了。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陈铨《野玫瑰》中的夏艳华,曾是上海的当红舞女“野玫瑰”,为着民族利益,她放弃了与进步青年刘云樵的爱情而嫁给了北平伪政权的实权人物王利民,为重庆方面传递情报,为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毫无疑问,彼时塑造抗日妓女形象,是有着动员全民抗战的现实效用。而在新世纪里,“妓女抗日”再次批量地进入文学叙事话语,又是究竟何为?考察新世纪的文化语境,除了市场经济对文学生产机制的制导外,我们不难触摸到此种现象背后的写作旨归,即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缓释民族文化被同质化的焦虑,以确证和重构本民族的文化身份。

我们知道,现代性进程其实是以西方现代性为标杆和参照,打量全部世界历史步伐的过程。伴随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和观念在全球扩散化和普遍化,一切民族文化的边界遭遇模糊或摧毁,文化趋于同质化或类型化。如何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覆盖中,确认和言说自己的民族身份成为许多后发现代化型的国家迫切需要,中国也不例外。“全球化是超越了民族国家体系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它的文化生活世界将自己又一次、并且在更大程度上‘普遍化’的客观过程和主观努力”^①。面对全球化浪潮促逼下的文化同质化压力,如何摆脱民族文化焦虑,确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呢?根据美国学者希尔斯的观点,传统为代代相传的事物,它可以是器物,也可以是人的行为方式、习俗礼仪乃至思想。在此意义上说,传统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先天性身份烙印。因此,重返传统,是确证自己民族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书写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发掘、检讨或激活传统文化中那些相对稳定、持久、边缘的部分,不失为一条缓释文化同质性的救赎之路。

青楼文化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陈腐却又是幽微而富有魅力的边缘地带,妓女也是传统文化中各个部分互有关联的喻体:“娼妓是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作出贡献的重要历史人物;娼妓是值得男性精英人士关注和大书特书的对象;娼妓是女性传统美德的典范,是借以抒发怀旧情绪、提供大众娱乐的对象,也是没有彻底改造好的臣民。”^②或许正因为此,妓女已然是中国文学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学原型,自唐传奇《霍小玉传》《李娃传》等最早出现妓女形象以后,妓女书写便成了中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割不断的妓女情结与文化想象。

至于“妓女救国”更是中国文人通常书写的故事母题与文化想象,这类妓女救国或爱国的故事,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屡见不鲜,比如《杨国夫人传》讲述梁红玉原为青楼女子,后被韩世忠赎身为妾,多次随夫出征,最后战死疆场。《李师师外传》中的李师师,颇有爱国情操,她将财富献给官府,作为抗击金人的军饷;她不愿侍奉金人,而请求出家当道士。《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致生死于度外,主动站出来与权奸作斗争。林语堂《京华烟云》叙述被称为护国娘娘的妓女赛金花的爱国壮举:“北京总算有救了,免除了大规模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有赖于名妓赛金花的福荫。”刘半农《赛金花本事》、夏衍《赛金花》亦复如此。

新世纪作家书写“妓女抗日”,延续的正是传统的“妓女救国”故事母题,只不过略加置换变形。由此可知,新世纪小说书写的“妓女抗日”传奇,正是一次对中国传统的回眸,而对传统的回望与承袭

^①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②[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410页。

必然源于现实的驱动。恰如霍布斯鲍姆指出：“（发明的传统）以重复的方式努力重申某些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并自动地表明与过去的连续性。……这些传统乃是对新情境的一种回应，这些新情境采取了参照旧情境的方式，或者说，它们以某种准义务式的重复来确立自己的过去。”^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新世纪作家书写“妓女抗日”，正是以一种“妓女救国”的重复方式，在“自动地表明与过去的连续性”，以便实现对传统的复辟与重拾，从而缓释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一性”的隐忧，确证民族文化身份之“独一性”。

综而论之，上述四类妓女形象成为了新世纪作家感应和体验中国现实的重要符码。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暧昧与纠结的复杂境遇，在各类妓女形象上得到了充分的映照，“逼良为娼型”追问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等，“赏心乐事型”批判消费主义时代的病像，“知亡国恨型”表明作家重返传统的取向，这三者均表现出反思、质疑与批判现代性的立场，而“从良幻灭型”则对阻滞现代性的传统道德观念表达出愤怒，彰显的是吁求现代性的急切。同为妓女形象，扭结了如此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恰如贺萧所论：“娼妓们无论被当作当代社会‘信任危机’的典型，还是被当作灵敏的晴雨表、用以测量新的经济社会压力，总之，在她们的选择以及别人赋予这些选择的意义中，显然都回荡着 20 世纪末中国社会更广泛的忧虑。”^②同样，这话也切合新世纪中国小说对妓女形象的塑造与重构。

（责任编辑：陆 林）

Prostitute Images in Novels of the New Century and China's Modernity

LEI Ming

Abstract: Prostitute images in novels of the new century are special metaphorical vehicles and narrative codes offering us insights into the social reality of China in the new century and an approach to the issue of China's modernity. These prostitutes mainly fall into four categories. Some are forced to engage in prostitution for utter misery, revealing the inequality of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the cruelty of modernity. Some choose to be prostitutes on their initiative, through whose experiences the authors criticize the typical ill mentality in the age of consumerism. Some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line with the motif of prostitutes saving the nation, indicating the authors' return to traditional values. Some are excluded from the rural society for their past as a prostitute thus failing to return to normal life. The first three types show the authors' reflections on and criticisms of modernity, while the last one manifests their calling for modernity and rage against the outdated traditional values. These prostitute images, endowed with different values in modernity, reveal the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xity of China's modernity.

Key words: novels in the new century; prostitute images; modernity

^①周宪：《文学与认同》，《文学评论》2006 年第 6 期。

^②[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 370 页。